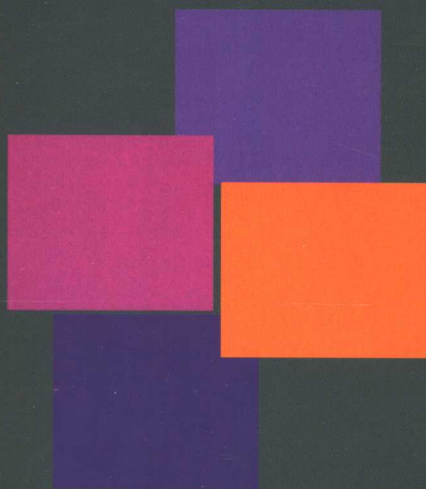


YUWEN CIDIAN LUNJI

语文词典论集

晁继周/著



商務印書館

语文词典论集

晁继周 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词典论集/晁继周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655-6

I. 语… II. 晁… III. ①汉语—词典—研究—文集
②《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①H16-53 ②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725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ÜWÉN CÍDIǎN LÙNJÍ

语文词典论集

晁继周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655-6/H·1155

2005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我 1978 年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室工作。二十多年来,我在和同事们一起参加编写、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系列辞书的同时,致力于词汇学和词典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 long 篇论文和短篇文字数十篇,现选出其中的 38 篇编成这个集子。

吕叔湘先生说过,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编词典不能不研究词汇学。在多年编写词典的过程中,遇到许许多多的词汇学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使自己的词汇学知识深化了。二十世纪末,当时的语言所所长刘坚先生主持编写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把现代汉语词汇学这一部分交给我。我用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五万余字的长篇综述性论文《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这篇论文成为本书“词汇篇”的主体。

词典是我的主业,掐指算来,已经做了二十七年。我从事的研究中,着力最多的要数词典学。我的工作一直是围绕着《现代汉语词典》进行的,在研究中我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给《现汉》定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提出了规范型词典的概念,先后发表了《略论规范型词典的特点》和《再论规范型词典的特点》,首先从收词,继而从词典编纂的其他方面,全面阐释了规范型词典同查考型词典、历史型词典、描写型词典的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汉语规范型词典的突出代表。专门讨论《现代汉语词典》编纂问题的论文还

有多篇,这些论文是《现汉》编写、修订的心得体会,对其他辞书的编纂也会有借鉴意义。以上内容组成了本书的第二部分——“词典篇”。

本书的第三部分名为“规范篇”。贯彻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是词典编纂,特别是规范型词典编纂的最重要问题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为宗旨,它在贯彻语言文字规范原则上作出了创造性的努力,出版以来在汉语规范化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近几年来,在如何贯彻语文规范标准方面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对词典编纂产生了不利影响。《树立正确的语文规范观》、《语文规范标准与规范型字词典的编写》等论文就是针对这些模糊认识写的。

第四部分是“红楼梦”。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和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共同主持编写《红楼梦辞典》,前后花了六年时间。这一段经历使我对《红楼梦》语言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对《红楼梦》的语言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一方面是拿《红楼梦》时代的语言同现代汉语作比较,另一方面是拿《红楼梦》原作者曹雪芹的语言同续写、修改者高鹗的语言作比较,这两个方面的比较研究都很有收获。

二十七载,弹指一挥。我也从少壮之年进入退休之年。自己觉得有必要把这几方面的心得集在一起,对自己的研究是个初步的总结,对读者在这几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也不无抛砖引玉的作用。承蒙商务印书馆慨允出版,本人在此谨表衷心感谢。书中不周全、不妥当的地方,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晁 继 周

2005年2月27日于北京华威西里墨雪斋

目 录

前言	1
词汇篇	1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3
把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结合起来	83
论异形词整理的原则	91
程度副词“怪”用法的演变	105
“昙花一现”里的“昙花”	112
村名中的“各”字溯源	114
关于“干警”一词的思考	116
词典篇	121
略论规范型词典的特点	
——兼论《现代汉语大词典》的收词原则	123
再论规范型词典的特点	
——从比较中认识规范型词典	137
汉语规范型词典编写的历史和面临的问题	145
关于规范型词典的收词问题	154
关于规范型词典收词问题的再思考	164
现代汉语规范型词典收录新词的原则	176

2 语文词典论集

《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地位·····	184
我国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	195
《现代汉语词典》与北京方言词·····	201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述略·····	208
《现汉》修订的重要出发点:促进规范·····	215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中的语音规范·····	222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修订举隅·····	232
与时俱进,做好《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	238
语文辞书编纂的成绩与不足	
——第四届国家辞书奖语文类辞书评奖总结·····	246
总结经验 为提高语文辞书编纂水平而努力	
——第五届国家辞书奖语文辞书评奖小结·····	253
汉语方言词典编纂的重大收获	
——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1 卷本·····	261
编纂汉语规范型词典的重要参考书	
——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264
简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278
简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282
评辞书编纂中的“抄袭有理”论·····	287
《现代汉语词典》的规范化和创造性	
——答王同亿先生·····	296
规范篇·····	305
树立正确的语文规范观·····	307
语言规范、辞书编纂与社会语言生活·····	318

语文规范标准与规范型字词典的编写·····	328
语音规范 8 问	
——《新华正音词典》代前言·····	335
从“六安”的读音谈起·····	343
红楼篇 ·····	345
《红楼梦辞典》编纂旨义浅述·····	347
《红楼梦词典》编写三议·····	354
曹雪芹与高鹗语言的比较·····	362
《红楼梦》中的“能干”和“年中”·····	375

词 汇 篇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

汉语词汇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文献中已有许多对词语直接作出解释的内容。对汉语字、词义的较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尔雅》和《说文》。从那时起到现在,也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词汇研究是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训诂学是解释古书字句的,换成现在的话说,是研究语义的。字书虽是讲字形的,但字书对字形的解释,大部分也是通过对字形的分析以求对字义有所证明。韵书除注明字的音切外也顾及意义。古汉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对字义的研究往往就是对词义的研究。因此可以说,传统的语言文字研究,为现代意义的词汇研究,为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准备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

现代意义的汉语词汇研究,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汉语词汇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建立起来,则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汉语词汇学所以能在本世纪建立并发展起来,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上个世纪末,在西学东渐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也开始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中的先进的东西。在《马氏文通》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学著作中,已经涉及词汇学的一些问题。如《正名卷》论及“字有一字一义者,亦有一字数义者”,“凡字之有数义者,未能拘于一类,必须

相其句中所处之位,乃可类焉”。这里谈到的实际上就是现代词汇学中所说的单义词和多义词,并指明多义词意义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上下文。《文通》还论述了构词法上的一些问题,如在《实字卷》中已明确说到用“双字同义”或“两字对待”的方式构成联合式双音词,甚至注意到了实语素与虚语素结合这种后来被称为附加式的构词现象。二十世纪前半叶,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三十年时间,许多学者借鉴国外语言研究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词汇问题,取得很大成绩。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语言的社会本质、关于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关于基本词汇及词汇与社会变化密切联系等的学说,成为语言研究的理论指导,苏联学者的语言学论著大量介绍到中国,成为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参考。五六十年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全面发展,汉语词汇学体系的初步建立,是与这样的理论指导和借鉴分不开的。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开始用更开阔的眼光看世界。这一时期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汉语词汇学的发展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如义素分析法的引进就大大推进了语义学的研究。

其次是社会变革的影响和国家语文政策的推动。二十世纪,我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革命变革。政治革命与文化革新总是相伴而行的。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随着民主革命的不断深入,在语文方面经历了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对词汇研究的直接影响是促使研究的材料从文言为主转变为现代语为主,同时也促使研究方法的更新,如从着眼于字,到着眼于词,进而对词语的形式和内容作进一步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语言文字工作受到政府的重视,五十年代提出了推广普通话、汉语规

范化和文字改革三大任务,这三项任务都与汉语词汇研究有着密切关系,从而推动词汇研究向着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三是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的互相推动作用。词汇研究与词典编纂是密切相关的两件工作。研究词汇的目的,归根结底是指导人们正确地理解词语、运用词语,而这一目的的实现,最好的办法是使词汇研究的成果体现到词典中来。词典的编写以词汇研究为基础,同时又反过来推动词汇研究的深入。词汇研究的材料往往是有限的,或者是经过挑选的;而词典编纂所用的材料比一般的词汇研究要宽泛得多。特别是专书词典的编纂,有时要对词语资料作穷尽式的考察。词汇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要在词典编纂过程中重新得到检验。本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汉语词汇研究取得的突出成就,明显地得益于这一时期编纂出版的各种品类的辞书。

本世纪汉语词汇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世纪初到1949年、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末以来。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汉语词汇学分为六个专题:词本位的确立、构词法研究、汉语的词汇构成和词汇规范问题、词义研究、熟语研究、词典编纂。

一 词本位的确立

(一) 观念的转变:由字到词

传统语文学中,字和词的界限是不清楚的,甚至只知有字不知有词。直到本世纪初,在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下,研究汉语的学者才建立起词的概念,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第一个提出词的概念的是章士钊。

章士钊在他所著的《中等国文典》(商务印书馆,1907)中论述了字、词和句子的关系:

句,集字而成者也。如《孟子》云:“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共九字为一句。分视之则为字,合观之则为句。此字与句之区别也。右所引句,共九字也,而自文法上视之,则“孟子”“齐宣王”“雪宫”,皆名词;“见”,动词;“于”,前置介词。名词三,动词一,前置介词一,共五词也。是一字可为一词(如“见”字为动词,“于”字为前置介词之类),而一词不必为一字(如“齐宣王”三字,“孟子”两字,始为一名词之类),泛论之则为字,而以文法规定之则为词。此字与词之区别也。

传统观念认为句子是由字组成的,章氏则称“律字以为词,规词以为句”,认为句子是由词构成的,这种认识比传统看法更准确、更科学了。章氏已经注意到有的词由一个字组成,有的词由两个字或更多的字组成。由于当时还没有提出语素的概念,在今人看来,章氏对字、词关系表述的科学性要打个折扣,但他的认识比过去只谈字不谈词的传统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则是确定无疑的。

章士钊所作的分析,是用现代的方法研究古代汉语的材料。二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已开始将观察重点转向现代汉语材料。古汉语词以单音节为主,在多数情况下,一个字就是一个词,传统方法只讲字不讲词,对于分析语句、理解意义并无大碍。现代汉语词汇向双音节和多音节发展,研究者如果仍旧把眼光盯在一个一个汉字上,就将寸步难行了。许多学者为在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中建立词的概念大声疾呼。1922年,黎锦熙在《国语中基本语词的统计研究》(《国文学会丛刊》1卷1号)中说:“我们如果要作一番客观的统计研究工夫,必须先从国语的本质找出我们语言中表

示整个观念的真正单位来”，“我们若不先从国语文法的范围内，将这些组成语句的单位分子作一番检查归纳的工夫，明白规定出来；一味率循旧章，把一个一个方块的单字，比照他们的 words，便效仿他们的统计方法，来研究解决这基本词汇问题；其结果，纵然制成了精密的图表，恐怕那所得的数目，很少很少，比他们要‘相去霄壤’，而且和自己语言中运用词类的实际也不相符。”

到四十年代，由字到词这种观念上的转变已经基本完成。王力、高名凯等学者在他们的语法专著中，表达了对词与字区别的具有结论性的意见。王力说：“有时候，一个字就有一个意义”，“有时候却是两个字才能有一个意义”，“由此看来，有些词是由一个字构成的，咱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单音词；另有些词是由两个字合成的，咱们可以把它们叫做双音词”（《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高名凯指出：“我们的一个‘字’并不一定能代表一个‘词’”，“要说明汉语的词是单音缀或是复音缀的，我们应当跑到文字后面去看说话的实在情况，看看在说话之中，代表一个独立的意义是由单音缀的词结构成的或者是由多数的音缀结构成的”。

词本位的确立，是汉语词汇学建立的前提，也是现代语法学的基础，在语文教学、词典编纂中也有着重要影响。

（二）词的界定

从“词”这个概念被提出来起，学者们就开始探讨“什么是词”的问题。把词与字分离开，是学术上的一个大进步。但是，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志，词的界限远非一望而知。因此，对“什么是词”的回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着眼于意义的。黎锦熙说，一个词表示一个观念（《新著国语文法》，1924）。王力说，一个词就是一个简单

的意义单位(《中国语法纲要》,1946)。这两种表述,都有它们的不足。表示一个观念的,不一定是词,也可能是词组,认为一个词表示一个观念,这种说法没有划清词与词组的界限。认为词是简单的意义单位,又没有划清词和语素的界限。

进入五十年代后,对词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语法研究的推动,另一方面是研究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推动。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普通话,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以词为书写单位,这就要求首先必须弄明白什么是词,以及怎样划分词。

这一时期对词的性质的研究,已经从注重意义转向注重形式、形式与意义结合。陆志韦等在如何确定词的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951年出版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1957年出版的《汉语的构词法》是研究这一专题的代表作。陆志韦认为,词是语言片段中能自由活动的最小单元。如何划分词,陆氏在《北京话单音词词汇》中试用过“同形替代法”。例如:

铁路	铁柱子	铁门坎儿
石头路	石头柱子	石头门坎儿
洋灰路	洋灰柱子	洋灰门坎儿

用同形替代分析的结果,“铁、石头、洋灰、路、柱子、门坎儿”都是词。这里显然混淆了词和语素的界限。1956年《北京话单音词词汇》重印时,作者声明放弃了这种分析方法。1957年在《汉语的构词法》中,作者提出“同形替代法”的根本弱点在于“基本上还只是肯定了汉字的孳生力的大小是鉴定词的标准。‘同形替代法’能不能建立起来,取决于不同的搭配上的频率”。

词包含语法学和词汇学两个层面,划分词与非词(语素、词组)

既着眼于形式,也不能忽视意义。对词划分的结果,既要在理论上站得住,即得到大多数语言学研究者的认可;也要为说汉语的广大群众所接受。《汉语的构词法》一书,对这样一个出发点有过重要的论述:

怎么知道一种是造句的结构,另一种是构词的结构呢?

那不是意义决定的。要认识词,主要的是凭它的内部结构,拿它来跟同一类型的造句结构互相比,在每一个类型上找出某种具体的条件来,说明所研究的语言片段已经不是造句的结构而是构词的结构了。

语言学者不能不从意义来认识词,但是词为什么是词,不能单凭意义的单纯性,紧凑性,抽象性等来决定。我们的工作是从分析语言结构入手的,是注重形式的,可不是“无意义”的……凭我们的结论所规定的词,必须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也必须对于在构词法上掌握过相当丰富的资料而得出过归纳性的结论的人具有说服力……对于各家的论著,不只是要学习它们的理论和审查所依据的资料,并且还要细心体会他们是凭怎样的心理(说汉语的人对祖国语言的直观认识)才肯定某些结构是汉语的词。

在否定了“同形替代法”之后,《汉语的构词法》一书采用“扩展法”来确定词。扩展法,也就是插入法,其基本原则是看一个语言成分能不能扩展,即能不能在中间插入别的成分,不能扩展的是词,能扩展的是词组。在分析不同的结构形式的时候,再加上一定的限制条件。比如“形+名”构成的名词性向心格,采用扩展法分析:中间不能插“的”的是词,如“杂面、白铁、咸盐、青苔、冷眼”等;中间能插“的”的是词组,如“活水、辣汤、大官、粗活、咸肉”等;中间